



文学史的潜力

人大课堂与八十年代文学

程光炜

杨庆祥

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文学史的潜力

人大课堂与八十年代文学

程光炜

杨庆祥

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史的潜力：人大课堂与八十年代文学/程光炜、杨庆祥主编.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5
ISBN 978-7-5039-5085-8

I. ①文… II. ①程… ②杨…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3749 号

文学史的潜力

——人大课堂与八十年代文学

主 编 程光炜 杨庆祥
责任编辑 潘 艳
封面设计 朱倩倩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84057660 (总编室)
(010) 84057696 84057698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26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5085-8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人大课堂与八十年代文学”参与者简介

主持人

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参与者

杨庆祥：男，1980 年生，安徽安庆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2006 级博士生。现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史。

黄 平：男，1981 年生，辽宁桓仁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2006 级博士生。现供职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

白 亮：男，1981 年生，陕西延长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2006 级博士生。现供职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

张伟栋：男，1979 年生，黑龙江哈尔滨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2007 级博士生。现供职于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史。

李 云：女，1981 年生，四川资阳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2007 级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通俗文化。

李建周：男，河北邢台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2007 级博士生。现供职于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史。

李建立：男，1978 年生，河南许昌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2005 级博士生。现供职于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

陈华积：男，广东阳春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2008 级博士

| 目 录 |

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演 程光炜 (1)

八十年代文学研究的“文学社会学” 程光炜 (19)

八十年代：“历史化”视野中的文学史问题 ... 杨庆祥 (43)

在“大历史”中建构“文学史”

——关于“重返八十年代文学” 杨庆祥 (65)

从“劳动”到“奋斗”

——“励志型”读法、改革文学与《平凡的世界》

..... 黄 平 (74)

“身份”转换和“认同”重建

——兼论《人啊，人！》进入历史叙述的方式 白 亮 (93)

“改革文学”的“认识性的装置”与“起源”问题

——重评《乔厂长上任记》兼及与新时期文学的关系

..... 张伟栋 (112)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与八十年代的文化逻辑

..... 张伟栋 (131)

“范导者”的失效

——当文本遭遇历史：《顽主》与“蛇口风波” 李 云 (151)

何谓“现代”，“自我”何从

——重读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兼及八十年代新潮批评

..... 杨晓帆 (172)

知青小说如何“寻根”

——《棋王》与寻根文学的剥离式批评 杨晓帆 (193)

八十年代“西方现代派”知识形态简论

——以袁可嘉的译介为例 李建立 (215)

在文学机制与社会想象之间

——从马原《虚构》看先锋小说的“经典化” 李建周 (232)

“米尼”们的“沉沦”

——王安忆小说转型研究 陈华积 (252)

以马原为对象看先锋小说的前史

——兼议作家形象建构对前史的筛选问题 虞金星 (270)

这一个“福奎”

——重读《最后一个渔佬儿》 虞金星 (288)

附录：人大课堂八十年代文学研究论文总索引 (311)

后 记 (323)

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演

程光炜

当代文学学科的“独特性”，首先在它与“当代”的多重纠缠，“当代”本身的激烈和复杂状态，决定了它不能像其他学科那样宣布自己是一个“纯文学”学科。其次，它要经常出现在各种“作品研讨会”现场，对“当前作品”开展繁重的宣传和评述工作。因此，当代文学学科给人的主要印象是，它是当前文学思潮、作品和现象最“理想”的“批评者”。显然应该认为，文学批评对当代作家和作品所进行的“经典化”工作是十分重要的。没有批评家对作品出色的认定和甄别，我们都无法知道哪些是“重要作家”、“重要作品”，文学史的课堂，就没有了最起码的依据。但问题是，当代文学已有近“六十年”的历史，已经是现代文学存在时间的两倍。它是否要“永远”停留在“批评”状态，而没有自己“历史化”的任务？这是我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说当代文学已经有了自己的“编年史”，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它的“文学史”意义？它与众不同的文学思潮、批评方式、创作风格，又是通过何种途径被指认的？它是不是存在着像 1949、1979 和 1985 这样的历史分界点，这些分界点对文学史研究又具有怎样的价值？

另外，应该怎么认识当代文学的“经典化”问题，如何看待文学杂志对作家观念的支配和引导，又如何看待文学事件在文学作品生成中的特殊作用等等，是不是都应该被列入研究的范围？这些东西，文学批评已无法面对，因为它们已经“沉淀”为了“历史”。但我这里所谈的，不是具体的研究，而是一些研究的可能性。进一步说，我所说的“可能性”是在什么意义上才具有有效性的问题。

今年5月，我写过一篇题为《诗歌研究的“历史感”》的文章。这篇文章涉及到文学研究的“历史化”问题，因受诗歌问题局限，有些讨论实际没有展开。不过，它对一些概念的限定和表述，可以作为我讨论当代文学学科“历史化”问题的基础：“除去对当下诗歌现象和作品的跟踪批评之外的研究，一般都应该称其为‘诗歌研究’。它指的是在拉开一段时间距离之后，用‘历史性’眼光和方法，去研究和分析一些诗歌创作中的问题。正因为其是‘历史性’的研究，所以研究对象已经包含了‘历史感’的成分。”^①显然，我所说的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首先与跟踪当前文学创作的评论活动不同；其次，它指的是经过文学评论、选本和课堂“筛选”过的作家作品，是一些“过去”了的文学事实，这样的工作，无疑产生了历史的自足性。也就是说，在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过程中，“创作”和“评论”已经不再代表当代文学的主体性，它们与杂志、事件、论争、生产方式和文学制度等因素处在同一位置，已经沉淀为当代文学史的若干个“部分”，是平行但有关系的诸多组件之一。这就是韦勒克和沃伦所明确指出的：“文学史旨在展示甲源于乙”，它“处理的是可以考证的事实”，“文学史的重要目的在于重新探索出作者的创作意图”，所以，它更大的价值是“重建历史的企图”。^②埃斯卡皮也认为，文学史家的作用“是‘跑到幕后’，去窥探文学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设法理解创作意图、分析创作手法。对

① 拙作《诗歌研究的“历史感”》，《新诗评论》2007年第2期。

② [美]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三联书店1984年11月版，第32-34页。

他来说，不存在什么作品的老化或死亡问题（笔者按：而这种观点是评论经常宣布的），因为他随时随地都能从思想上构拟出能使作品重新获得美学意义的参照体系。这是一种历史的态度”^①。

一、文学史研究的“批评化”问题

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首先是如何区分“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的不同作用和某些细微差别。我们知道，“文学批评”是先“文学史研究”一步而发生的，它对“刚刚发生”的作家作品的批评和分析，对“经典”作品的认定或对“非经典”作品的排斥，成为后来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基础；但与此同时，由于文学批评在有些年代的地位过高，文学批评的作用就被无形地放大，会过分“干扰”文学史更为理性化的过滤、归类和反思性的工作。而文学史研究的“批评化”，指的正是这些“影响”、“干扰”文学史研究的因素。这种文学史研究的批评化，实际也不再是严格的文学批评，而具有了模糊暧昧的文学史研究的面目，并带有强行进入文学史叙述的现时功利性。

它模糊的文学史面目，在八十年代是通过“文论化”（也即“批评化”）的研究方式建立起来的。^②一大批“文学批评家”，成为了事实上的“文学史家”，他们的观点、主张、设想和结论，“理所当然”地成

① [法] 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于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6、87页。

② 在八十年代，“文学史家”的角色是非常模糊的，而所谓的“文学研究者”主要是那些著名的批评家，如李泽厚、刘再复、鲁枢元、刘晓波、刘小枫、吴亮、许子东、季红真、黄子平、南帆、王晓明、蔡翔、李劫、夏中义，包括赵园、王富仁、钱理群、蓝棣之等等。很多人都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探索文学书系》和浙江文艺出版社的《新人文论丛书》这两套丛书中“出名”。而这两套丛书的主旨就是“提出问题”、“发表新鲜主张”，带有以“批评”代替“研究”的鲜明特色，为此，吴亮把它们概括成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叫做“批评即选择”。

为当代文学史研究成果和结论。^① 这就是杨庆祥所指出的：“‘先锋小说’当时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强调文学本身的‘独立性’和‘自足性’，强调批评观念上的‘审美’原则和‘文本主义’”，提倡者“虽然比吴亮、程德培等人对‘先锋小说’的态度更加谨慎，但同属于上海‘先锋批评’的圈内人，不可能不受到影响，而且，在‘重写文学史’中起到不可或缺作用的李劫是当时最活跃的先锋批评家。所以说先锋小说的写作观念和批评方法实际上对‘重写文学史’影响甚大”^②。其实，不光是当代文学史研究，即使在现代文学史研究中，这种以“批评”的结果影响或主导“文学史”研究结论的现象，也非常明显的存在着。举例来说，就是引人注目的“鲁迅研究”。那些已经被“批评化”了的“鲁迅形象”，不仅成为许多鲁迅研究者的“研究结论”，而且也显而易见地成为关于鲁迅研究的文学史成果。^③ 另外，从当时提倡“重写文学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诸多文章中一眼即知，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鲁迅研究的基本结论，实际是这种“批评化”倾向的渗透和延

① 人们不难发现，在1979到1987年间出版的许多当代文学史著作，如大家熟知的《新时期文学六年》、《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当代中国文学概观》、《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以及十四院校、九院校合作完成的诸多文学史著作等，都受到了上述批评家文学描述和批评的强大影响，很多“文学史结论”，事实上都是“批评的结论”。

② 杨庆祥：《审美原则、叙事体式 and 文学史的“权力”——再谈“重写文学史”》，未刊。此系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问题”博士生讨论课上的主讲论文。

③ 参见王富仁的《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反封建革命的一面镜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先驱者的形象》（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压在心上的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走进当代的鲁迅》（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稍后出现的汪晖、王晓明、李欧梵的“鲁迅研究”在研究的角度和评价尺度上有所不同。但总的讲，王、钱的研究在鲁迅研究界代表着“主流”形态，并成为国内鲁迅研究思想和学术基础。这个基础，不仅把鲁迅看做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楷模”，而且也看成是一种统驭所有文学现象的“标准”，并以此作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最重要的起点和最后结论。这些结论，还带有“文学批评”的话语色彩，如“思想者”、“战士”、“匕首”、“孤独者”、“镜子”、“无地彷徨”、“反抗”、“生命体验”、“心灵的诗”、“说不尽的阿Q”、“鲁迅与二十世纪中国”、“鲁迅与北大”、“脊梁”、“桥梁”、“人格魅力”、“摄魂”等等。

伸，“批评化”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被等同于“文学史”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在这样的研究眼光中，被预设的‘历史’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隐身在所进行的评价和分析过程之中。所以，无论是研究者，还是被研究者所观照的研究对象，丝毫不会觉得自己是被一种东西所‘强迫’的，他们往往还会觉得这就是自己的‘发明’和‘创造’。”^①

在这里，我不想比较“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的“优劣”，因为如果那样的话，这种做法仍然是一种“批评化”的研究。我的意思是想说，八十年代形成的“文论化”研究倾向和方式，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被“历史化”，它们仍然以“在场”的方式存在于当前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之中。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对什么是“批评的结论”和“文学史结论”的关系做一些初步讨论。

在一次关于马原小说《虚构》的课堂讨论上，一位学生对我和别的老师合著的《当代文学史》对这篇论文的“评价”提出质疑，他认为这个“结论”不是我们作出的，而是来自吴亮非常有名的评论文章《马原的叙述圈套》的“结论”。^② 这对我有很大的提醒。我随即找来最近几年出版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发现都有大同小异的情形。我注意到，批评家当年精彩的“最好的小说家，是视文字叙述与世界一体的”，“他不像大多数小说家只是想象自己生活在虚构的文字里，他是真的生活在自己虚构的文字里”的批评性表述，或者说这些其实非常“思潮化”的看法，一直没有受到研究者的质疑，没有经过检讨和过滤就进入了文学史的叙述。也就是说，文学史并没有发挥“过滤”文学创作、批评和杂志等“现场因素”的职能，而对批评家的这种感性化文学感受采取了完全认同的态度。因为，将“最好的小说家”的“标准”等同于“虚构”的观点，恰恰来自于1985年一种借叛逆“现实主义文学”而强调的“非写实”的思潮，是先锋批评根据当时文学转型需要而提出的

① 拙作《诗歌研究的“历史感”》，《新诗评论》2007年第2期。

② 吴亮：《马原的叙述圈套》，《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3期。

临时性的批评主张。我们应该相信,根据丰富的文学史经验和参照系统,“最好”的小说家实际未必都一定是“虚构”型的作家。一种可靠的文学史叙述恰恰应该是,根据“批评结论”,参照当下思潮,并依据浩大历史时空中的诸多“最好”的小说家“类型”,来建立马原是否是“最好的小说家”的判断。我想这可能正是这位同学尖锐“质疑”我们的文学史著作的一个理由。

当然也必须看到,“文学史结论”不一定就具有学术上的优越性,很多“沉睡”多年的“文学史结论”,确实仍然需要“批评的结论”去唤醒和激活。文学史的“历史化”过程,如果完全抛开“批评结论”而最终实现也将是一个问题。但文学史结论更需要警觉的是,把“刚刚发生”的作家作品的批评和分析,或把对“经典”作品的认定和对“非经典”作品的排斥不加选择地都带入研究工作中,致使文学史研究被不确定性的批评所裹挟、所笼罩,从而陷入“批评化”的尴尬境地。这不是我们故弄玄虚。这种文学史写作的危险性,确曾发生在1979年初版的两部重要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中,它的典型例证即是对浩然现象的仓促的“重评”。^①任南南在《历史的浮标——新时期初期的“浩然重评”现象研究》一文中认为:“这种重评作家的方式与拨乱反正的主流政治之间也呈现出良好的互动。‘文革’后,与政治上揭批四人帮的全国性群众运动一同展开的浩然重评,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文革’后主流政治话语生产的一部分。”但她警告说:“浩然的去经典化,甚至矮化显示出把四人帮颠倒过去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颠倒过来的时代主题,是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拨乱反正运用的文学手段,新时期政治合法化进程中的一个文学图示。”所以,她认为“浩然重评”很大程度上恰好是一个值得今天去检讨的“批评性”结论。^②

① 如张钟等的《当代中国文学概观》、郭志刚等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与“浩然重评”相关的章节,这些根据当时社会结论对这位作家的“重评”不仅遭到他本人的质疑,实际也是今天最具有“争议”的文学史问题之一。

② 任南南:《历史的浮标——新时期初期“浩然重评”现象的再评价》,《海南师学院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自然，文学史研究的“批评化”，是由于当代文学学科对批评“当下性”过分迷恋的认知方式带来的。很多人都相信，所谓的“当代”文学史研究，实际就是针对文学“现状”而出现的一种批评性的表达方式。在当代文学学科中，“批评家”的地位一般都要高于“文学史家”，很多国家级的、“文学奖”最后获奖者往往是前者，就是一个可以随时列举的例证。这种“当下性”的“文学史意识形态”，并不认为“批评化”就是对文学史研究的直接损害，而是相反，它相信恰恰使“当代文学”学科处在比其他学科更为“前沿”和“敏锐”的历史处境中。^①正因为如此，“叙述圈套”说、“浩然重评”论至今仍被认为是不容置疑的“文学史结论”，没有人相信它们仅仅是“批评化”的结果。当然，我这样说，不存在“褒贬”任何一方的含义，目的是要通过它们之间地位的“差异性”存在，说明“批评化”思维在目前文学研究中所具有的特殊影响力。

二、认同式研究与有距离的研究

在当代文学学科中，很少有人会怀疑“认同式”研究有什么“问题”。既然“按照通常所知道的历史教科书知识，所有的‘历史’都是可以被预设的。因为如果不能这样，我们就无法与过去的历史之间建立一种信任和联系”^②，那么就不会去注意，即我们的“认同”实际是被历史所控制的“认同”。当我们以为是在从事“自己”的研究时，它其实是在重复别的研究者已经建立的研究方法。

先说第一种认同化研究的现象。在许多大学讲授当代文学史的课堂

① 类似情况近年来仍然如此。在出版图书中，与“批评”有关的当代文学研究著作明显占有绝对性的比重，如2002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南方批评书系”、2002年河南大学出版社的“世纪之门文艺时评丛书”、2004年前后山东文艺出版社的“e批评丛书”、2003年苏州大学出版社的“新人文对话录丛书”等多种。据不完全统计，这两年，“文学史”研究丛书仅仅有2005年河南大学出版社的“文艺风云书系”这一套。

② 拙作《诗歌研究的“历史感”》，《新诗评论》2007年第2期。

上，一个普遍现象是对“主体性”理论的“盖棺论定”的解释。在不少研究中，从“揭露伤痕”到“建立主体性”的解释逻辑，有时候还成为评价“新潮小说”的一个权威性标准。出于对十年浩劫灾难的深切反思，“主体性”的理论建构当然有其历史合理性。但是显然，对“非悲剧”的“风格”的“反思”，它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新潮小说对于死亡的表现可以说是对这种以偶然性为核心的小说结构的最有意思的象喻”，“在马原、洪峰等作家笔下，死亡都是那样毫无理由、莫名其妙”，“当‘神秘’成了新潮作家对于世界的唯一解释时，不仅科学、智慧、思想、公理、常识变得可笑，而且人与世界变得一样‘不可知’，我们只能任由迷信、宿命的气息对人与世界的篡改。这实际上不是彰显的新潮作家主体性的强大，而恰恰是其主体性脆弱不堪的证明。”^①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种习惯于把“新潮小说”置于“主体性”视野中的做法，并不是出于自觉反思而得出的结论，而是一种受到历史结论所控制的学术性认同。因为，当我们感觉是以“个人化批评”的立场来“反思”新潮小说存在的“问题”时，不是我们“发现”了，而实际是“主体性”理论“帮助”我们认识并纠正了它走向的历史性偏差。这正像一篇讨论“主体论”历史生成语境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自新时期文学发生以来，各种力量就参与着对它的‘规划’和‘建构’，这一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将自我‘历史化’的过程。这种‘历史化’不仅肩负着为新时期文学命名、定位的重任，同时也通过这种‘命名’行为为‘新时期文学’构建自己的‘传统’。”^②显而易见，我们所“熟悉”的许多课堂的讲授和研究都处在这种“无意识”的“认同”之中，因此也受到历史结论的强有力控制。当然，我更想说的，不是这种“控制”损害了研究的自足性，而是要强调，为什么不去问问我们是“怎么”被“控制”的？是不是也应该对“被控制”的学术状态做一点点研究，并

① 吴义勤：《“悲剧性”的迷失——反思中国当代新潮小说的美学风格》，《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② 杨庆祥：《“主体论”与“新时期文学”的建构》，《当代文坛》2007年第6期。

对由此而导致的“认同化”研究作出一些必要的“反思”？

其次，对别人研究方法的“认同式”研究。众所周知，最近几年当代文学学科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已基本完成了“历史化”过程。一些研究者对“十七年”的研究，所提供的“方法论”意义实际已远远超出了“研究本身”，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些“方法”的认同式研究也随之产生。“《文艺报》作为社会主义文艺体制下的文学媒体刊物，在建国初期起到了动员全体国民、增强民众凝聚力、建构国族认同的重要作用。”^①“在十七年文学中，新上海被赋予了无产阶级左翼意义，并消除了原有口岸城市的所有资本主义逻辑。在社会主义性质的工业中心这一概念中，体现着消除城市历史由多元而引起的差异与不统一的内在含义。”^②这样的“研究”虽然不能说不好，而且它们利用了难得的“第一手”历史文献——但却每每让人联想起“百花时代研究”、“潜在写作研究”的既有面孔。当然，所谓《文艺报》的“改组现象”，左翼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分化与重组”，“潜在写作”对七十年代反主流诗歌的明确指认等等，它们也同样是一种“建构式”的学术研究。不过，仍有理由觉得，当我们面对这些“方法”时，更有价值的研究恐怕应该是那种与它们拉开“距离”的至为艰苦和复杂的继续开掘。它们“不一定”都是我们研究的一个“必然性”的“起点”。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质疑、反问和继续探讨，可能还应该从这些“学术成果”的“起点”上开始。所以，我今天提出这样一个看法，即：既然已经有了一个“十七年研究”，但是不是还应该有一个从它开始的“重返十七年”的研究呢？这是因为，表面上，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历史时空中，可以“分享”共同的“学术成果”。但实际上，由于每个人历史经验、个人记忆、背景和知识结构的差异，大

① 魏宝涛：《〈文艺报〉与“十七年”文学批评标准和模式的建构》，《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② 李力：《工业题材与国家工业化的想象——对十七年上海文学的一种考察》，《学术论坛》2007年第3期。

家却不一定就有一个“共同”的一成不变的“十七年”。每一个人对它的“历史想象”和“文学处理”，很大程度上要受制于这些因素的影响与规约，用别人的“成果”来覆盖自己的“历史想象”和“文学处理”是非常不应该的，它只能招致一种“无效”的劳动。自然，我不是说“已有成果”不能“利用”，而是说“怎样利用”，在一种什么意义上“利用”，同时又不把它变成对自己工作的一种“替代性”研究。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这后一点，恐怕是非常重要的。

在“已有成果”起点上开始的研究，正是我要说的“有距离的研究”。“所谓‘有距离感’的存在，指的可能还不是‘故意’与研究对象‘拉开’什么心理距离，装着与己无关的样子。它指的是，如何从历史‘风暴’形成的知识‘气流’中脱身出来，如何既在历史中说话，但又能够不受它的文学意识形态的暗示与控制，有意识地用‘自己’的方式来说话。”^① 举例来说，当年我们在阅读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时都被深深感动过，在大学教书的这些年，我们就把这种“感动”讲述给学生，因此而“感动”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但是去年，当我为课堂讨论“重读”这篇小说的时候，却再也“感动”不起来了。与此同时，我在“重读”礼平的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的时候，依然被它“感动”了，而且“感动”得更厉害，情不自禁地为其中深层次的意味流下了眼泪。这就是我要“讨论”的下一个问题：即，你为什么在25年后还会被“感动”？或不再被“感动”？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我想仅仅在“审美”层面上是无法做到的。我之所以不愿意再从“审美”层面上谈，正说明我与两篇小说之间产生了“历史性”的“距离”，这种距离的存在，酝酿并强化了我对它们的新认识。我曾经在一些场合说过，《班主任》之所以获得比《晚霞》更大的“成功”，并“感动”了一代代读者，是因为它的文学叙述与当时的历史语境、文学成规、氛围、批评等制度化环境是一种非常“匹配”的关系。换句话说，人们与其是被

① 拙作《诗歌研究的“历史感”》，《新诗评论》2007年第2期。

“作品”感动的，不如说是被那些与之配套的“制度因素”感动的。实际上，不光在八十年代，文学史上曾经“多次”地发生过相类似的事情，即“文学制度”帮助众多读者“理解”了这些作家和作品。也就是说，我们是首先“相信”了作品周围的“这些因素”，也才“相信”作品告诉我们的那个“故事”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班主任》周围强大的“制度因素”控制了我们的认同，并使我们忽视了作品文本的单薄和干瘪；而当我们今天对这些“制度因素”保持更高的研究警觉性的时候，作品文本那些早已存在的“问题”，就一下子“暴露”了出来。《晚霞》的情况可能正与之相反。这就是我要说的“历史化”的工作，即把“感动”或“不再感动”的阅读现象与当时“制度化”的文学环境区分开来，把作品文本与课堂讲授区分开来，要避免出现不加分析和研究就得出的结论。这种“有距离的研究”还表明，既然我们把文学经典带进了课堂教学和科研之中，就不能再把自己当做“一般的读者”，我们正在讲授和研究的并不是“正在发生”的“历史”，而是研究者“曾经经历”过的“历史”。

至为重要的是，当我们面对如此众多和出色的“已有成果”时，应该怎样开展“自己”的工作。在我看来，“已有成果”事实上是对文学经典及现象的一次有价值的“重读”，我们的研究，恰恰是对这“重读”的另一次“重读”。“‘当代文学’的‘发生’，在过去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经常被忽略。‘当代文学’常被看作因政权更迭、时代变迁而自然产生。这种叙述方式，对证明‘当代文学’诞生的‘历史必然’和它存在的‘真理性’虽说相当有效，但在学术研究上”，“却引起了我们对许多矛盾、裂缝的注意”^①。这样的“表述”，说明研究者正站在与研究对象不同的“历史语境”，它是以“今天”的语境为根据而开展的对“过去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重读”性的研究工作。这样的已有成果之所以“出色”，正是因为它是一种能够“及时”利用

^①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自序》，三联书店2002年8月版。